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
学术研究史丛书

哲学专辑

楼宇烈 主编

宋文坚 / 著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

福

建

人

民
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哲学专辑

楼宇烈/主编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

● 宋文坚/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宋文坚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6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ISBN 7-211-04649-X

I. 逻… II. 宋… III. 逻辑史—研究

IV. B8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100 号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

LUOJIXUE DE CHUANRU YU YANJIU

宋文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15.375 印张 2 插页 404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4649—X

B·66 定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概 述

20 世纪逻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研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900～1949 年西方逻辑学传入我国并在我国传播并得到初步发展阶段；1949～1966 年我国学者进一步开展逻辑教学和研究阶段；1977～2000 年我国逻辑教学和科研繁荣发展阶段。

20 世纪初我国开始引进外国逻辑学著作和逻辑学教科书。著名的有严复译 S. 密尔《穆勒名学》、S. 耶方斯《名学浅说》，田吴炤译十时弥《论理学纲要》，王国维译 S. 耶方斯《辩学》。这些著作在我国影响很大。同时，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国学者还根据上述译著编写了近 80 种逻辑学教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张子 and 的《新论理学》、屠孝实的《名学纲要》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由于日著教材和我国学者根据这些教材自编的教材对逻辑的科学性质和逻辑规律的表述不准确、不严谨，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受当时苏联批判形式逻辑的影响，我国部分哲学家对形式逻辑产生严重误解。在 1933～1937 年间，国内开展了一场火药味浓、言辞激烈的对形式逻辑的讨伐式批判。这场批判在我国哲学界留有一些“后遗症”，小部分颇有名气的哲学界人士长时间仍把形式逻辑看作是和辩证法相对立的低级逻辑。但是这场批判对我国当时的逻辑教学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19 世纪末，另一种类型的逻辑——数理逻辑已经诞生。最早把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的是英国人罗素。1920 年，罗素在北京大学做了包括数理逻辑在内的五大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命题演算和类



逻辑。此后我国也有学者做了数理逻辑的引进和介绍工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种孙、张邦铭译的《罗素算理哲学》，张申府发表了译文《罗素的演绎论》，肖文灿、朱言钧、陶祖运等在刊物上介绍了数理逻辑和集合论。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汪奠基的著作《逻辑与数学逻辑论》。这是中国最早介绍数理逻辑及其历史发展的著作。1937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汪奠基的著作《现代逻辑》，介绍了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逻辑、关系逻辑、类型论、摹状词理论，此外还介绍了当时逻辑学的一些新进展，如三值逻辑。

对我国数理逻辑传播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是金岳霖。1925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在清华和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其讲义以“逻辑”为名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影响久远，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被许多大学用作逻辑学教材。金岳霖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多篇数理逻辑方面的文章。金岳霖所培养的学生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殷海光、王浩、周礼全等都走上数理逻辑之路，成为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逻辑学家。他们中有些人如胡世华、沈有鼎、王浩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20世纪前期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归纳逻辑的研究。最早发表归纳逻辑研究文章的是黄子通。1930年，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连载文章讨论归纳的哲学问题。1940年，张蔭麟发表文章《归纳逻辑新论发端》，提出新的确定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金岳霖在他的著作《论道》和《知识论》中用较多篇幅讨论了归纳逻辑中的休谟问题，即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质疑。金岳霖修正罗素的归纳原则，加进时间因素，论证了归纳原则的永真性。他认为这样就解决了休谟问题。不过他的解决方案受到后人质疑。事实上，他也没能解决休谟问题。

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开启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他们将中国先秦名辩向西方逻辑学挂靠，认为先秦名辩就是逻辑学。从而兴起中西逻辑学比较研究。参与研究的学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章士钊、栾调甫、谭戒甫、杜国庠、伍非百、虞

愚等。

因明被看作古印度发展起来的逻辑学，有古因明和新因明之分。唐玄奘到印度取得的佛教经典中，就包含多种因明著作，因明由此传入我国，称汉传因明。汉传因明又东传入日本。但在我国后世研究者少，典籍逸失。北宋时期因明传入西藏并被研究发展，称藏传因明。19世纪末期我国杨文会从日本蒐集一些因明著作，因明研究开始复苏。西方逻辑学传入后，研究者将因明与逻辑学作了比较研究。参与者有章太炎、熊十力、吕徵、太虚、陈大齐、虞愚等，他们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20世纪前期我国逻辑学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重要问题：一、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中西方逻辑学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可探讨和可提高之处。二、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逻辑的大批判，有许多可总结的东西，比如学风问题。还未真正了解形式逻辑及其科学性质就胡乱地加以批判，其根子在于学风不正。遗憾的是，我国有些哲学家老是爱犯这类毛病。三、金岳霖《逻辑》一书，是我国最早和在世界上领先的大学逻辑学革新教材。如果沿着金岳霖的改革之路走下去，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科研将不会是后来那种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的普通逻辑教学全面学习苏联，以苏联的教材为范本。引进的有影响的教材有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高尔斯基、塔瓦涅茨的《逻辑》，高尔斯基的《逻辑学》，以及一些苏联中等学校的教材，如维诺格拉道夫、库兹明的《逻辑学》。我国还聘请一些苏联专家来华讲逻辑学。大部分教材和苏联专家的面授，内容只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古典归纳逻辑。只有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高尔斯基的《逻辑学》，介绍了数理逻辑的一点粗浅知识，对数理逻辑有较新评价。但此书出版较晚，且不久我国即进入十年动乱时期，因而影响较小。对我国普通逻辑教学影响最大的是前几本书，尤以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和苏联专家的面授为甚。我国这时期



也自编了一些逻辑学教材，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教育部组织的统编教材《形式逻辑》，一般都采用苏联逻辑学模式编写。所有这类教材，观念落后，内容陈旧。由这类教材培养了我国的一代逻辑学工作者，其中有的人也发生一些随后的影响。

对我国逻辑学发展有影响的还有苏联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的文章被介绍到我国，引发了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期的逻辑问题大讨论。讨论内容包括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问题，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形式正确性和内容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什么是辩证逻辑及其和形式逻辑及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等。1979 年吴家国写了关于这次讨论中各方的观点的介绍性文章《关于形式逻辑讨论问题的回顾》，对这次讨论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1956 年我国编制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包括数理逻辑发展规划。同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很重要。这样，1956~1957 年报刊上发表了一批介绍数理逻辑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胡世华的《数理逻辑的基本特征与科学意义》。由此数理逻辑的科研、学术交流、科研队伍的建设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我国形成以胡世华为主的可计算性理论研究及其在计算机上的应用研究的科研群体、以莫绍揆为主的递归论科研群体以及北京大学和社科院形成的逻辑演算的科研群体。同时，在一些大学理科院系也有数理逻辑工作者在进行科研活动，如王世强、王湘浩、高恒珊等。因而，这期间中国数理逻辑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更多学者参与归纳逻辑的研究，但他们关注的是古典归纳逻辑，讨论的是古典归纳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归纳推理的结构、归纳推理的科学性质、归纳逻辑的历史发展等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也取得较重要的进展。一、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素质较高的科研队伍。二、在构建中国逻辑史学科方面有良好开端，开始创建完整的中国逻辑史学科。如汪奠基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写成《中国逻辑思想简史》一书，受到较好评价。三、在先秦名辩研究方面有超过以往水平的重要成果。如沈有鼎的著作《墨辩的逻辑学》，评者认为这把墨辩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詹剑峰 1956 年出版的《墨家的形式逻辑》也受到好评。

因明研究低迷。原因是这门学问深奥，研究者要有较好的佛学和国学功底，要会梵文。因而后进者不多。而老的研究者大多年事已高。只有吕徵、虞愚、杜国庠、沈剑英等在因明的发展史、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因明和西方逻辑学比较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多篇文章。

总结这一时期我国逻辑教学和研究，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普通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是我国逻辑教学的历史大倒退。为什么能让落后的苏联普通逻辑教材占据我国大学讲台这么久，确有许多可总结的。二、50 年代中后期到 60 年代初的逻辑大讨论，是在苏联教材和苏联逻辑讨论的影响下开展的。这场讨论有许多可深思的地方。主要包括为什么在西方（逻辑学产自西方）不是问题的东西我们却讨论不休？这场讨论有益于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和课程建设吗？为什么搞逻辑学的人却违反逻辑学替一些极荒唐的论点找理由或搞诡辩？本书中笔者将对上述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评述。三、我国逻辑学工作者在这一时期有了工作定位和科研方向的初步划定。经过上述逻辑大讨论，出现了一批辩证逻辑学者。他们根据各自在讨论中的观点，确定了自己认定的研究辩证逻辑方向，我国由此出现了不同的辩证逻辑学派。这时期参与归纳逻辑研究的学者后来开始在归纳方面进行科研工作。中国逻辑史和因明的研究方面形成一个两者兼作的学者群体。数理逻辑和它的应用研究都有了自己人数可观的研究群体。中国逻辑事业出现发展极其有望的欣欣局面，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差点毁了这一切。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逻辑学在这段时间几乎无所发展。“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当代逻辑科学的发展、国外新逻辑学教材的引进，以及对之前我国



逻辑教学的总结，人们对普通逻辑课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逻辑课除了原有的提高思维素质的作用外，还增加了专业基础课的作用、逻辑导引课的作用。因而我国原有的逻辑教学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较之国外的逻辑教学，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苏联的逻辑教学，我们的课程内容显得相当陈旧和贫乏。这就把我国普通逻辑课程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979 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提出“逻辑课程要现代化”的建议，得到国内逻辑界的积极响应。由此中国普通逻辑教学走上了改革之路。经过多方面的准备，如翻译引进国外的同类逻辑学教材、召开全国性逻辑改革交流会等，80 年代后逐步推出一些改革了的逻辑教材。到 90 年代后，普通逻辑教学改革又加快了步伐，出现一批内容更新、更现代化的教材。在编写教材和交流改革思路的过程中，对“逻辑教学现代化”的理解上的分歧导致了两派意见的出现。一派认为，普通逻辑课应逐步以教授现代逻辑为主。一派认为，应以传统逻辑为主，逐步增添现代逻辑的内容。笔者在本书中对两派分歧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普通逻辑教学改革，还应考虑读者对象。在有些系科，应直接讲授现代逻辑，学生应具有一阶逻辑的完整知识。在有些学校专业应介绍较多的数理逻辑内容，包括演算、形式证明，以及领悟现代逻辑较通常的概念，但也要介绍传统逻辑和归纳逻辑的部分知识。在有些学校专业，目前应逐步适当增加一些数理逻辑的观点和方法或者开设兼有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分析等内容的课程。目前，我国在一些课堂上讲的批判性思维课对于训练学生思维分辨能力有益。严格按照批判性思维原旨精神讲授的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精神，不盲从、不盲信有益。但这类课程没有给出多少用之有效（能行性）的方法，更没有现代逻辑的内容，因此它不是也很好的逻辑课。

改革开放以来数理逻辑的科研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在逻辑演算及应用逻辑、模型论、递归论和公理集合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极其丰富。

逻辑演算和应用逻辑的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古典演算、模态

逻辑、时态逻辑、问句逻辑、无穷逻辑、弗协调逻辑、多主体认知逻辑、邻域语义学、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中介逻辑、参态逻辑、开放逻辑等种种逻辑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在模型论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王世强和他的学生沈复兴、罗里波、沈恩绍等人在经典模型论、格值模型论、多值逻辑模型论、无穷逻辑模型论、布尔值模型论、模型论代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在递归论研究方面，胡世华所领导的递归论科研群体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此时胡世华年已古稀，但仍提出了他个人研究的新成果：可解决性理论 I ~ III。中科院软件所的杨东屏、眭跃飞、李昂生等则开辟了我国递归论研究的新方向——递归可枚举集的结构的研究，并取得一些很重要成果。南京大学莫绍揆、沈百英等在递归算术等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南京大学丁德成等则在国内递归论研究新方向即递归脱殊性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公理集合论研究方面，莫绍揆进行了关于 ZFC 系统公理的归约和替代研究。张锦文将弗晰集合论和布尔值集合论作了统一处理，他还取得了范畴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赵希顺、李娜、张树果、张再跃等人也进行了集合论方面的研究并有好的成就。中科院数学所冯琦在公理集合论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高水平成果。

我国数理逻辑在这段时期的确有了很大发展和繁荣，但是在数理逻辑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如何抓住热点问题，搞好研究基地的建设和分工协作；如何处理好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如何善于和勇于提出问题；如何大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更好地鼓励中青年学者作开创性的研究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使数理逻辑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归纳的研究，主要是由中青年学者承担的。他们进行了和国际接轨的研究，做出了有很高水平的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瞩目。在这段时间，我国学者对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主要包括非巴斯卡概率逻辑研究，这一工作主要围绕 J·科恩的归纳逻辑系



统而展开；关于排除归纳法的重建；关于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研究和改进；关于确证逻辑的研究；关于归纳悖论的研究；关于归纳逻辑系统及其语义的一般研究。我国归纳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问题；归纳逻辑研究中的归纳观念和归纳创新的关系问题；归纳逻辑和科学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在本书中重点介绍了我国学者所论及的归纳逻辑的发展前景问题。

在逻辑学在科学活动中的应用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重要的成果，有些还是世界水平和世界领先的。

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唐稚松用时序逻辑作工具研制软件工程环境系统 XYZ 的工作；周巢臣对 Hoare 逻辑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发展出的关于程序语义描述、程序检验的新技术；周巢臣还提出一种新的一阶谓词时序逻辑作为实时系统与混成系统的规范语言；陶仁骥、管纪文进行了关于自动机理论的研究；胡谋等进行了关于多值逻辑在计算机上的应用研究等。

数理逻辑在数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方面主要是王世强、沈复兴等人的研究。王世强还写了《独立于 ZFC 的数学问题》（与杨守廉合著）和《数理逻辑与范畴论应用》（与孟晓青合著）两本著作并在其中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我国的归纳逻辑应用研究主要是归纳逻辑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应用。在逻辑学的应用研究方面我国逻辑学者还进行了逻辑学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创建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逻辑哲学是逻辑学在哲学中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国学者在逻辑哲学的内涵、逻辑的定义、真理理论、意义理论、悖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成果。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逻辑史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西方逻辑史研究方面，我国出版了若干西方逻辑史包括数理逻辑发展史和现代归纳的发展史的著作，以及关于西方逻辑学尤其

数理逻辑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弗雷格、哥德尔、蒯因等的逻辑思想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显示我国学者的研究有较高的水平。

我国这一时期的因明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因明研究队伍扩大，素质提高。二、学术活动活跃。三、因明研究成果可观。四、因明研究中开展了争论。这些都说明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

中国逻辑史研究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取得很大成绩。整体说来，本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有以下突出方面：一、中国逻辑史领域学术工作有很大开展。学者队伍壮大，培养人才的工作上了高档次。学术交流开展频繁。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科研成果丰硕，构建起了完整的先秦逻辑体系，开拓出通古达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三、对研究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理论和原则有深入的探讨。四、在一些重要的逻辑论题上有广泛的讨论。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之初，就开展了学术争论。几十年来这种争论延续不断。且与时俱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争论又深入发展，涉及一些最根本性的方面，出现两个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争议问题。其一，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中使用的中西逻辑学比照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误导了研究，使研究一开始就走错方向。其二，关于中国先秦名辩是不是逻辑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它只是名学和辩学，是争论的辩术，而非逻辑。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在中国逻辑史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震荡。

我国 20 世纪逻辑界很多争论、分歧都涉及逻辑观的问题：逻辑是什么？它研究什么？它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它的作用是什么？等等。笔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逻辑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因而就会有先进的也会有落后的、陈旧的。大学应该向学生传授先进的逻辑观念。教师更应持有先进的逻辑观念。这样才能推动我国逻辑科研和教学事业的发展。在推动我国逻辑科研方面，笔者谈了对现代逻辑的应用研究的一些看法，并认为，这是我国学者大可有为



的天地。

本书在附录里介绍了我国学者关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和讨论。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作出的努力和持有的精神都是很可贵的。目前国内多数逻辑学者认为辩证逻辑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笔者认为：一、辩证逻辑可以是一个研究领域，但它能否成为一门逻辑学科则须严格认定。二、有些辩证逻辑学者所说的辩证思维形式和辩证思维规律人为性很大，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可能会走进误区。

总观 20 世纪我国逻辑学，虽然起步较晚，且几经挫折，甚至停顿、倒退，但在我国广大逻辑学者的艰辛努力下，仍取得极其重要的成果，成就巨大。更主要的是，这些成果、成就，奠定了我国逻辑学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搭起了为我国逻辑学者造就 21 世纪辉煌的舞台。在祖国建设事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强力推动下，我国逻辑学者定会有更加出色的成就。我国逻辑学和国际逻辑学并驾齐驱的时日将不会遥远。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出 版 说 明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 20 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 20 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其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

1998 年初，我社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共同筹划编纂一套反映 20 世纪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丛书，并定名为《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后，我们约请到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四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并由他们规划框架，制订体例，拟定选目，延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承担编写工作。

在诸位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这部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系列近 30 册的丛书终得面世。从酝酿到成书的六年间，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中国传统学术包容广博，蕴涵深厚，讲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 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科，亦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质。唯其如此，这套丛书的选题



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不仅限于对各学科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各书的布局 and 风格，亦不强求体例的划一，旨在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驰骋其表现才能，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这部丛书面世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并指出，要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体会《意见》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到这部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希望也相信这部丛书能够为《意见》中所指出的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做出自己的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前 言

一、20 世纪无疑是我国社会最富变动的时期。大事件、大动荡在一个较长时期里绵延频仍。“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则迎来一片“阳光春天”。这些必然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和教育事业。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之也时兴时衰、时沉时浮，有喜有忧、有苦有甘。

二、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到 20 世纪它有了巨大的惊人发展。与前两千年相比，逻辑学的新发展犹如平地林立高楼。逻辑学现今已是拥有多种类型和众多分支的庞大学科群体。它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之第二位。逻辑学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开花结果，得到发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之动荡起伏，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遭际，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面貌和阶段性。

三、编写 20 世纪中国逻辑学，反映它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按逻辑类型分别编写该学科 20 世纪在中国的演进情况。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各逻辑类型的发展能条理清晰，不足处是不能反映 20 世纪中国逻辑在不同时期的整体面貌。不能展现中国逻辑发展的阶段性，再者如何划分类型，现在争议很大。

本书的写法是，将 20 世纪的中国逻辑学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为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引进西方逻辑，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1949～1966 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教学上受苏联逻辑影响较大，数理逻辑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开展。改革开



放到 20 世纪末为第三个时期。这是中国逻辑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①相应地，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来反映这三个时期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情况。这样的编写方式，能体现 20 世纪中国逻辑学各阶段的整体面貌。当然，由于各阶段发展不一，本书各编的篇幅会不甚平衡。不过这也正好反映了中国逻辑学的实际状况。

四、20 世纪我国逻辑学有一个特殊情况即辩证逻辑问题。我国逻辑界有不少学者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付出了艰辛劳动和心血，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一大批辩证逻辑著作。但也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辩证逻辑还不算一门成熟的学科，或者认为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而是哲学、认识论。这一争议至今未有结果。本书为避免这类纠葛，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不把辩证逻辑列入为逻辑学，而以附录的形式对我国辩证逻辑的研究作出介绍。

五、由于本书在写作中论证的需要，对学者的著述多有引录。凡行文里可以表明的，一律不加引号，也多不注出处。各篇章的编写中也依据了一些特定资料，在各章书中作出注证或说明。行文内括号中的解释说明，凡未特注者，均为本书作者所加。本书对涉及的外国学者，一般尽可能使用标准译名，凡无标准译名的一般用该学者的原文名称。本书区分段落使用的序号依次为一、（一）、1、（1）、1）。本书纪年凡未特注者，一律为 20 世纪的年代。

六、20 世纪我国逻辑文献数量巨大。限于笔者的能力、精力和编写的时限，只能选读其中小部分，因而难免漏掉一些重要著述，湮没一些重要成果，也难免有许多欠妥之处，敬希我国逻辑界同仁指正。

七、在此对于给笔者以各种帮助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①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逻辑学研究在这段时间几乎无所发展，故本书未将此时期列入，在此予以说明。